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李加莉 著

THE APPROACHES TO
ACCULTURATION RESEARCH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THE APPROACHES TO
ACCULTURATION RESEARCH

李加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李加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097 - 6811 - 2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化传播 - 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0050 号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著 者 / 李加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811 - 2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李加莉 1971 年生，湖北省嘉鱼县人，跨文化传播学博士，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适应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及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武汉大学“70 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跨文化传播创新研究团队”成员。出版著作 1 部，副主编大学英语教材 2 本，主持省部级课题 1 项，先后在《上海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南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两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杂志转载，一篇获“第七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4 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跨文化传播学中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
(项目编号: 14G010)

序：文化适应研究的意义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对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适应了。于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文化适应一直是一个吸引众多学者思考而又难求正解的问题。本书的作者试图厘清文化适应研究的脉络，探寻其中的理论难题并摆脱它的纠缠，从而为人们开辟文化适应的新路径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首先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阅读渴望。

人是一种寻求交往的动物，在人类交往史中，文化适应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人类学考古上的发现一再向我们解释，不同的生态环境塑造出不同人群行为，进而促成针对特定生态的文化适应。根据 19 世纪的人类学发现，来自异文化的初民群体对本土文化适应过程是从“海盗型文化适应”（piratical acculturation）过渡到“敌对型文化适应”（inimical acculturation）、“姻亲型文化适应”（marital acculturation），再到高级和文明的“友好型文化适应”（amicable acculturation）。^① 初民部落起初只是简单粗暴地

① W. J. McGee, “Piratical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1, No. 8 (Aug., 1898), pp. 243 - 249.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直接模仿对方群体的武器和象征符号，以期掠夺对方的“神力”为自己所用，从而赢得战争，实现工具上的文化适应，进而通过强迫对方群体中的女性嫁给自己部落的男性，完成跨部落婚姻，来传递本群体信仰与文化模式，再逐渐过渡到通过协商与物品贸易，乃至跨文化教育来达成与异文化的友好交往，各取所需。这种带有文化进化论思维的早期文化适应研究往往有一种“理论野心”，不仅力求还原初民群体交往的历史图谱，更试图从低层次文化适应与高层次文化适应的过渡与演进中尝试图解人类跨文化交往的转型历程。

在初民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介环节相对较少，交往程度相对停留在浅层，交往模式也相对简单，一个外来部落对本土社群中的其他部落之间的文化适应并不复杂。财产与社会地位的竞争导致病态适应的消除，目的在于保存本族人群的种族健全和文化活力。^①但在对不同文化群体进行田野观察的时候，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文化”并非一个固定且一成不变的封闭概念，更很难通过简单的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来诠释。对特定群体的微观观察需要放置在一个联系的、更为广泛的交往层次上进行诠释，一个群体的文化形式如何传播到另一个群体中去，不同的文化群体生活特质与社会结构如何能形成“共同体”，现代资本主义如何渗透到传统社会中去，这些都需要文化适应研究的视角。世界并不是一个“台球桌”，各个文化只会在上面相互碰撞而互不相连，相反，

① W. G. Sumner,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Ginn, 1906.

历史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进程。^① 在某些墨西哥村庄里，初民社会与城市阶级之间分野鲜明，两个群体之间交往甚少，唯一能促成他们产生关联的就是从初民过渡到市民的这个过程^②，而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并不必然意味着“得到”某些文化特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模式的“失去”，在处于变迁的族群里，那些无法适应新的时间与空间要求的文化行为、习俗被无情抛弃了。一旦我们忽略了这一点，过度阐释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与分立性，或是过度强调现代社会的绝对优越性，二元对立的刻板成见便不可避免。文化适应研究则持续关注着不同人群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以期获得历史事实的另一种图式。

怀着类似的期待，20 世纪前半叶，以美国大城市中的“他者”为研究对象的文化适应研究，开始关注异文化群体如何同本土社会、文化发生作用与反作用。在 20 世纪初，伴随着大量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大城市，来自异文化的陌生人（stranger）、文化旅居者（sojourner）、边缘人群体（marginal man）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与跨文化交往方式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的前提或假设是，异文化群体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认同了本土文化，而他们对本土文化的反作用力与其文化适应的程度密切相关。对外来文化群体成员而言，是否适应本土文化以及适应程度如何，往往与他们来到新文化环境中的原因和本身的移民倾向有关。从 1850 年到 1920

① 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② Robert Redfield, “The Folk Society and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No. 5 (Mar., 1940), pp. 731 - 742.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年，超过 100 万瑞典人选择迁移到诸如明尼苏达、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以及芝加哥之类的美国大城市，这一时期的瑞典由于灾荒与农业危机，加上政治迫害与宗教纷争，移民美国的人口激增^①，这些瑞典移民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以及躲避政治与宗教迫害。而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难民从伊拉克、叙利亚来到瑞典，对他们而言，这种选择几乎完全是被动的，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适应异文化的准备。于是透过文化适应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出于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因素而选择移民的文化群体，接受与适应新国度里的文化环境意愿和程度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倾向于被新文化涵化，以美国人的文化习惯与要求来重新定义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并找到在这个新文化当中自己的位置，很多人甚至完全遗忘了他们的母语，^② 从语言和宗教信仰上最先实现对美国文化的适应。但与此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保留或改造了自己原来的瑞典文化传统，使之与美国社会不相冲突。

而战争移民，如来自越战的移民，他们更倾向于保留自己原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由于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选择移民往往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对新环境的适应意愿与倾向并不强烈。^③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尽管最终留下，

① 参见〔瑞典〕安德生《瑞典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2。

② Florence Edith Janson, *The Background of Swedish Immigration, 1840 - 193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p. 118.

③ Young Yun Kim, *Communication and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An Integrative Theor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1988, p. 5.

但在文化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上强烈归属于自己原本的文化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原有的文化模式与新环境中的文化模式极有可能发生激烈冲突。至于只在异文化当中做短期停留的文化旅居者，他们则更愿意在较为边缘的地带与主文化产生接触，他们可能有着特定的旅居意图，而且这个意图并不需要完全适应新文化就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主文化的适应程度可能会降到最低，而与自己原属文化群体保持更多的交往。^① 对跨文化交往中的群体文化适应程度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文化交往的复杂面向，另一方面又加深对群体间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跨文化策略，以避免冲突或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本身拥有丰富跨文化经验的学者加入到移民研究当中时，他们发现，简单的“我”与“他”的群体划分并不足以诠释跨文化交往在个体层面的复杂性，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可能会受到群体行为规范的指引，但并不能解释行为本身的动因。于是文化心理学者从个体出发，试图找出文化适应程度在个体层面的差异及其原因。从根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切误解与冲突首先源于我们失去或弱化了感知文化差异的跨文化敏感。而发展文化差异的积极意义、克服其消极意义，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入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过程，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②

① Ronald Taft, "Coping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 in Neil Warren, ed., *Studies in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Volume 1*, London: Academic Press, pp. 121 - 153.

② J. W. Berry, "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 (2008): 328 - 336.

告诉我们，文化适应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过程，长期适应也不意味着文化适应的终结，因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取向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包含两个维度：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而由于主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尽相同，这个双维度模型展示出全球化的四种可能后果：（1）世界文化的同质化；（2）相互的改变；（3）非主流群体抗拒支配群体的运动；（4）非主流文化被毁灭。类似的跨文化心理学对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试图找到“人”与“社会”，个体心理层面与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结合点^①，当个人被放置于社会生活之中时，其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倾向会指导其行为，进而对其人际交往与群体交往发生直接影响。借助“人”这个载体，微观的个体文化适应与宏观的社会文化调适（adjustment）被统合到同一个理论范畴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跨文化转型过程中个体所遭遇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如何转化为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调适。^②

到今天，文化适应研究的视野也更加宽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让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磨合成为新的研究兴趣，本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资本体系？全球资本在迁徙过程中又如何与地方文化相匹配？“球土化（glocalization）”一

① J. W. 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 (1997): 5-34.

② C. Ward, "Acculturation", in D. Landis & R. Bhagat, 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pp. 124-147.

词的诞生显得适逢其时，它讨论的是本土文化在面对强势的全球资本扩张时，如何吸收其影响，并通过自然地转换使之适应本土文化，区分出与自己文化不同但可以共存的相异之处，从而消解全球化的某些不相容特性，丰富本土社群的文化。^①到这里，文化适应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本土—全球这个双向的适应。“适应”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动态过程，很难去定义文化适应研究究竟是什么，它的核心在于关注人—人群—社会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关注人类交往关系与互动模型变迁，而非简单地关注或比较某一或某几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异同，这或许是人们醉心于其中的意义所在。

李加莉长期从事外语教学，热心于跨文化传播实践，在与外国留学生的交往过程中深刻领悟了文化适应的重要意义，由此涵泳于文化适应研究的文献海洋，打捞出思想的精华，也体悟到思想的困局，遂成此作，完成了对文化适应研究的系统总结。读者诸君可顺着她的论说得以窥见文化适应理论的堂奥，反思自我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或许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跨文化路径。这的确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是为序。

单 波

甲午年冬至于珞珈山

①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Macmillan, 2000, p. 284.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面向跨文化交流困境的文化适应研究	0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001
第二节 被持续探讨的文化适应研究	006
第三节 考察文化适应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022
第二章 文化适应研究的核心概念与视野转变	027
第一节 文化适应内涵的演变	028
第二节 “文化”诠释及其研究理路	036
第三节 研究对象：“他者”的视野转向	046
第三章 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多样化的文化个体 与普适性的心理诠释	056
第一节 个体层面对文化适应模式的探寻	057
第二节 个体层面影响文化适应的因素：解释力 的缺失	071
第三节 重新审视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	080
第四节 个体层面改善文化适应状况的理论话语	097
小 结	109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第四章 人际、群体间的文化适应研究：自我与	
他者之间平衡点的寻觅	111
第一节 陌生人：文化融合的迷失	112
第二节 文化适应中的传播网络：自我和他者	
之间的关系	132
第三节 我们和他们：群体间的接触假设及局限	153
小 结	162
第五章 社会文化层面的文化适应研究：多元视角与	
阐释的不确定性	164
第一节 文化适应研究中的文化考量	165
第二节 熔炉和色拉拼盘：社会整合的不同路径	185
第三节 族群文化身份的情境性和渐变性	197
第四节 文化适应研究全球化思维的悖论	210
小 结	222
第六章 文化适应研究面临的挑战及展望	225
第一节 文化适应研究面临的挑战	225
第二节 跨文化传播学中文化适应研究的缺陷及	
研究前景	228
附录 访文化适应研究领军人物约翰·贝利教授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54
后 记	269

第一章

导论：面向跨文化交流困境 的文化适应研究

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传播问题的重要来源，很自然地成为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一个热点。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文化适应理论多样，它们以不同的学科视角研究和阐释着文化适应现象，有着其内在的理路。另外，由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一，研究和分析的方法各异，文化适应理论体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在全球化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探讨普适性的文化适应策略必定会出现理论的内在冲突，而在冲突中探寻文化适应的可能性，则成为反思文化适应理论的出发点。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跨文化传播是植根于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的历史现象。如今随着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使得跨文化传播成为历史巨轮的轴心，于是文化间的互动扮演了引导、批判甚至抗拒人类社会变

迁的角色。文化处在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之中，一方面在文化内部它对自身文化在不断地习得、传承和延续，即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另一方面在与他文化密切和直接的接触中相互影响、不断产生着变化，即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认识到文化内部和文化间发生的变化为跨文化对话开辟了可能性，因为文化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它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地调整 and 变化着。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那么文化适应研究则探究“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或“文化群体”在与他者的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change），以及这些变化的前因、后果和遭遇的挑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不同群体在最初较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世界观。当不同文化群体需要彼此交往和相互了解时，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差别成为痛苦和冲突的来源。文化是意义、价值和行为标准的整合系统，社会中人据此生活并通过社会化将其在代际传递。^①人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和他的文化的承载者，所以文化总是首先表现为某些人的文化，某些个体文化或群体文化。不同的人群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也相应地拥有不同的特定人群，这些特定人群就成为某种具有文化属性的文化中人。对文化中人而言，文化的意义体系在路径清晰的已知世界和未知不明的外部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保护性屏障。一方面，对文化中人而言，文化具有心理功能，特别是减少恐惧和焦虑

① [美] 罗伯特·F. 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王卓君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32页。

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文化中人对他者的闯入和移入产生不安和焦虑。^① 所以，超越文化边界而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常常会导致文化不适应的状况发生，引起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文化身份的冲突和矛盾、文化信仰的缺失和迷茫、价值判断的失据、行为的失范等，继而在个人、群体和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一系列问题。

当代社会从现代性的“固体”阶段过渡到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谓的“流动的时代”（Liquid Times），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② 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家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口的全球流动正在加速，人们的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一个由留学生、移民、难民、商旅人士、外籍劳工等流动人口组成的庞大的“跨文化交往群体”正与日俱增。移民已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上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数量可观的移民社群，在一些工业国家里，非本国公民占到总人口 5% 的比例。^③ 据联合国 2009 年的数据统计，全世界有 1.91 亿人移居国外，除移民以外还有 1400 万的难民和背井离乡的避难者，此外还有大量的短期居留者，总计有 300 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和 3000 万由于工作关系移居海外的人士。而 2013 年全世界移民达到 2.32

① 单波、王金礼：《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载单波、石义彬主编《跨文化传播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 44 页。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③ [美] 拉里·A. 萨默瓦、[美] 理查德·E. 波特：《跨文化传播》，闵惠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 8 页。